

两部史著与一个话题

——中国当代文学史写作的跨学科思考

王达敏

(安徽大学 中文系, 安徽 合肥 230039)

摘要: 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写作, 从提出至今始终是学术的热点, 而围绕它进行的努力和讨论仍有不足的地方。本文以《科学史》和《西方哲学史》两部学术经典的写作为范例, 归纳出它们的成功为当代文学史的写作所提供出的启示。这也是跳出文学史来思考文学史的写作的一个尝试。

关键词: 当代文学史写作; 《科学史》; 《西方哲学史》; 政治; 距离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 A

两部史著, 一部是英国学者丹皮尔著的《科学史》, 一部是英国哲学家、数理逻辑学家、分析哲学创始人之一的罗素著的《西方哲学史》; 一个话题, 即中国当代文学史写作的话题。两部史著均为世界学术名著, 前者初版于 1929 年, 后者初版于 1946 年, 近半个多世纪以来, 恰是人类知识增长最快的时代, 即通称的知识大爆炸时代。在这个时代, 人类知识中得到最大发展、取得最高成就的是科学, 科学成为整个知识体系的中心, 对社会的进步和人类的进程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而一切知识与思维之灵魂的哲学也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 获得了越来越深广的发展, 与科学一并成为最富有思想、发现和创造活力的学科之一。在知识瞬息万变的时代, 一部史著若能撑住十年而不衰必是优秀之作, 而能越半个多世纪仍昂首挺胸行走学界的史著定是经典之作。经典是创新, 是永恒。经典不仅属于一个时代, 而且属于所有时代。学术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 在于它能超越一时一地之限定而在科学或知识的发展进程中, 有一个恒定的价值。《科学史》和《西方哲学史》无疑具有经典性, 它们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写作有何启示呢?

中国当代文学史写作话题的缘起, 远因与陈思和、王晓明于 1988 年 7 月提出“重写文学史”的主张并由此引发的一场不大不小的讨论相关。“重写文学史”的倡导者关注的是中国新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 “重新研究、评估中国新文学重要作家、作品和文学思潮、现象”, “冲击那些似乎已成定论的文学史结论”,^[1] 探讨文学史研究多元化的可能性, “把文学史研究从那种仅仅以政治思想理论为出发点的狭隘的研究思路中解脱出来”^[2]。陈思和直言: “‘重写文学史’首先要解决的, 不是要在现有的文学史著作行列里再多几种新的文学史, 也不是在现有的文学史基础上再立几个作家的专论, 而是要改变这门学科的性质, 使之从属于整个革命史传统教育状态下摆脱出来, 成为一门独立的、审美的文学史学科。”^[3] 这场讨论对 20 世纪 90 年代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写作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近因直接源于 1999 年出版的几部中国当代文学史。1999 年, 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洪子诚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杨匡汉、孟繁华主编的《共和国文学五十年》、张炯编著的《新中国文学史》等史著的出版, 展示了中国当代文学史写作的新水平。尤其是前二者, 由于较大程度地摆脱了体制性写作的框架和教科书惯常的思维定势, 在个性化的研究中充分地显示出学术性和创造性, 因而引起学界特别的重视。善意的赞誉与善意的批评并起, 争论自然不可免, 但不是意气用事或门户之见, 执著于学术的见解, 结果成为对前两著的成就与缺陷的指辨。前两著在新的语境中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作了一次有意义的“重写”, 然而, 从它们的缺陷及其他多部文学史著作来看, 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中还存在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 于是, 从 2000 年初开始, 关于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写作遂

成为学术热点。

持至今日的这场讨论，目的是如何写好一部中国当代文学史。既然如此，话题必然要以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的现状为逻辑起点，在此基础上运思并提出看法。在对现有的文学史文本与理想的文学史文本的对比中所作的思考，主要集中在这样一些看法上：文学史分“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两种研究的所长所短互见(洪子诚)。怎样将两种研究统一在一个和谐的结构里，应该是此种看法的未尽之言；文学史写作要求从当代文学所处的历史语境出发，科学地评价它的价值和地位(李杨)；文学史是自身发展演变的历史，当代文学史不仅要写出历程，也要写出流变、规律(潘旭澜、金汉)；文学史是一个经典的过程，是通过对作品的不断阐释和评价完成的，应在经典的作品之间，建立起一种内在的逻辑关系，建立起一种文学秩序(於可训)；当代文学曾在较长时间内受制于政治，如今，一种厌恶政治越位干涉文学及文学政治化倾向的情绪直接导致了学界对那段文学的评价，对其要么回避，要么作偏于一极的绝对性判断。对此，一种意见认为，应该把政治文化这一概念引入研究之中，在政治与文学之间找到结合的桥梁，客观地探究政治是以何种方式、在哪些方面、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乃至决定了这一段文学的基本走向，形构了文学最基本的特征(朱晓进)。另一种意见认为，当代文学史写作要摆脱政治决定论，虽然文学与政治无法截然分离，但不等于文学完全由政治决定，文学的历史不能被看作是为政治所完全封闭，文学会依靠自身的力量显现出它与历史和传统的联系及其独特的价值(董之林)；当代文学史不能写成大陆当代文学史或汉文学史，它应该包括台港澳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陈思和、刘登瀚、朱水涌等)。丁帆特就当前文学史研究中存在的简单的重新排座次、过激的虚无主义和貌似客观中性的史实性叙述的三种方法提出批评，期望有一种更好的研究方法进入真正的文学史语境中。昌切认为当代文学的修史者总是处在缺席的、不在场的状态，无论是以往的革命叙事的当代文学史或者是后来的启蒙叙事的当代文学史，虽然揭示了文学史过程的某些面相，但也掩盖了真正的文学史过程。文学史写作必须考虑史家意识，真正回到学界的岗位。

总之，上述的看法与见解都是在针对现有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文本的前提下作出的有意义的思考，无论是出招还是质疑，其运思均源于文学史又归于文学史。这应该没错，然而，在学科设定的框架内提出的问题，常常有效也有限，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就是这个道理。我在想，能不能走出文学史，从其他学科经典性的史著那里获得特别的启示呢？在科学发展的过程中，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相互参照、相互启示，往往会获得最大的收获。出于这样的想法，我将参照的对象锁定在《科学史》和《西方哲学史》两部史著上。

这两部史著都没有把自己的视界局限在严格的学科意义上的“科学史”和“哲学史”的范围，而是从它们所处的历史语境中拈出与它们相互作用又影响着它们发展方向的其他的思想形式和社会内容，在整体的观照中析出它们的发生、发展及演进规律。

先看《科学史》。

科学是关于自然世界的有条理的知识，是人类知识最高的存在形式，它历来被视为自满自足、纯然一体的存在。这种性质决定着它可以不与其他的思想形式、知识形式打交道。科学语言是一种高度抽象化的语言，它要“尽可能地用数学的方式并按照物理学的概念，来对现象作出解释”^[4]。科学语言把物质世界符号化，这种符号化语言是特殊专门的，又是无差异的。如果说人类的语言是文化的最高的凝聚形式，它在信息贮存与信息传达上诉求于文化的差异性与共生性，那么，科学语言则是无国界、无族别、无文化差异的最简单的语言。因此，一部科学史可以写成纯粹的关于科学本身发展的历史，一般的科学史都是这样写的。丹皮尔突破了科学史的范型，他从科学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中研究科学史，该著的题名也突出了这个特点，书名全称为《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丹皮尔说：“在希腊人看来，哲学和科学是一个东西，在中世纪，两者又和神学合为一体。文艺复兴以后，采用实验方法研究自然，哲学和科学才分道扬镳；因为自然科学开始建立在牛顿动力学的基础上，而康德和黑格尔的追随者则引导唯心主义的哲学离开了当代的科学，同时，当代的科学也很快地对形而上学不加工理了。不过，进化论的生物学以及现代数学和物理学，却一方面使科学思想臻于深邃，另一方面又迫使哲学家对科学不得不加以重视，因为科学现在对哲学，对神

学，对宗教，又有了意义。与此同时，物理学本来有很长时间就一直在寻找，并且找到了所观察到的现象的机械模型，这时却似乎终于接触到一些新概念，在这些概念里，机械模型是不中用的，同时也似乎终于接触到一些根本的东西，这些东西，用牛顿的话来说，“肯定不是机械”。^[4]不是机械的，那肯定是哲学的。我不知道别人在读到这段文字后是怎样的感受，我只知道我在十多年前的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为研究科学哲学和文化思想史并写作《稳态学》，第一次读到这段文字时，我对人类知识特别是对科学的走向的掌握一下子被明晰化了。我后来能够写成《稳态学》，能够在《20 世纪：科学统一化的时代》一文里对人类从古至今的科学的发展，以及科学与哲学始合、后分、再合的历史作出准确的论述，并在此基础上将科学的发展大体上分为“科学与哲学一体化的时代”、“科学分析与分解的时代”、“科学统一化的时代”，由此进而把握 20 世纪科学及其他知识形式、思想形式建构和发展的特点，最早受益于这段论述和《科学史》全书。丹皮尔这段高屋建瓴、简洁明晰的论述，是将人类整个知识的发展囊括在胸，从中勾勒出以科学为中心的人类知识的走向，可谓大手笔。完全可以不涉及哲学和宗教的科学史，因写了它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就独标高格、不同凡响了。《科学史》经典性的形成，其因首在此，次在具体研究与写作中体现出的博识与厚实的学术含量。

再看《西方哲学史》。

既然丹皮尔从科学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中撰写了一部经典性的科学史，那么，罗素也完全可以从哲学与科学和宗教的关系中写出经典性的哲学史。照理说，这样准行。因为从科学发展史的实际情况来看，写好了科学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并附之一些影响科学产生的文化因素，足以对付一部科学史。但哲学史的情况远比科学史复杂，其一，哲学伸展的面比科学宽广得多，且脉路漫漶，因而比科学的走向更难以把握。它与科学相关的部分，主要是科学哲学及一般的概念，它的触角几乎伸入到所有学科。其二，从哲学史的实际情况来看，它与政治和社会环境的关系在很多情况下比它与科学和宗教的关系更大，所以，仅从哲学与科学和宗教的关系中研究哲学史就显得不够了。相对来说，研究哲学史比研究科学史的难度更大，要求更高。罗素是 20 世纪世界一流的哲学家，他在进行哲学、数学、逻辑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广泛的研究的同时，还能腾出手来研究并撰写出《西方哲学史》这部经典之作，真是哲学史学科的幸福。

只有一流的哲学家才能写出一流的哲学史。艾兰·乌德说：“伯特兰·罗素是一位没有一个哲学体系的哲学家。换句话说，他是一位属于各派哲学的哲学家。几乎没有一个当代重要哲学观点我们不可以发现是表现在他的某个时期的著作中。”^[5]这样的哲学家更有利于哲学史研究。

罗素的这部哲学史全名为《西方哲学史——及其与从古代到现代的政治、社会情况的联系》。题中的“社会情况”亦可译为“社会环境”、“社会生活”，在书中，三者是同义等值的，常常互用。“社会情况”也好，“社会环境”或“社会生活”也好，无非都是一种具有弹性的全称，把不能为一项确切的指称所范围的多项思想形式、知识形式合并为一。在这部史著中，社会情况包括神学、宗教、科学、文化、文明、历史等多项内容。

罗素的思路是这样的：哲学是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并不是卓越的个人所做出的孤立的思考，而是曾经有各种体系盛行过的各种社会性格的产物与成因。这里有一种互为因果关系，人们生活的环境在决定他们的哲学上起着很大的作用，然而反过来他们的哲学又在决定他们的环境上起着很大的作用。这种贯穿着许多世纪的交互作用就是本书的主题。“哲学史已经很多了，但据我所知，还没有一部其目的与我为自己所定的完全相同。”哲学家既是因，又是果，他们是他们时代的社会环境和政治制度的结果，他们也可能是塑造后来时代的政治制度信仰的原因。“在大多数哲学史中，每一个哲学家都是仿佛出现于真空中一样；除了顶多和早先的哲学家思想有些联系外，他们的见解总是被描述得好像和其他方面没有关系似的。”与此相反，在真相所能容许的范围内，“我总是试图把每一个哲学家显示为他的环境的产物，显示为一个以笼统而广泛的形式，具体地并集中地表现了以他作为其中一个成员的社会所共有的思想与感情的人。”^[6]

这样的哲学史才是有源有流、连根带叶的鲜活的哲学史、真正的哲学史。

现在谈中国当代文学史写作。

学科有别，学理相通。《科学史》和《西方哲学史》对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的启示，落实到对比性视界中，显现为经典文本对形构中的文本的启示。

启示一：中国当代文学史写作要求从当代文学所处的社会环境出发，写出它的特点和发展。对中国当代文学来说，特别是对“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来说，写好文学与社会环境的关系，实际上就是写好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这一点是由中国当代社会的特殊性所决定的。从战争年代发展起来的政治，带着战争思维进入新生的共和国，在新政权制定并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政治处于中心地位，成为所有力量中占主导地位的力量，对整个社会起着主控作用，一切都成为政治的表现形式，一切都成为对政治的言说。这是一个政治权力越来越膨胀、政治意识全民化的时代，政治一方面把全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发挥到顶极状态，在令人难以置信的艰难条件下，不仅创造了让世人震惊的奇迹，而且还营构了一个积极奉献、高扬崇高理想的时代精神。另一方面，在政治称大且没有其他力量对其进行制约的条件下，政治无意识层内潜存的信息被唤醒，它带着本能的褊狭保守、原始的攻击性和破坏性冲出历史的尘封，在接上现实关系后，很快发展成为一种与整个社会“形相合实相背”的力量。它越演越烈，当它一手导演的极左路线、极左思潮和阶级斗争成为整个社会的主向时，历史迅速倒退，最终酿成一个悲剧的时代。

政治就其本质而言是反文明、反人道、反和平、反进步的，政治源起于权力欲求的过盛与利益集团的私利，源起于本能的防御意识和原始的攻击破坏，从这一点来说，它本质上又是保守的。历史上国家与国家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利益集团之间、宗教派别之间发动的无数次血腥战争，多由政治所为，或由政治与其他力量合谋共设。政治在后来的文明进程中逐渐演变为文明的、文化的表现形式，成为人类社会组织结构中不可缺少的一种力量，一方面是为了发展政治文化而强大自己，以取得政治在整个社会中的合法性地位。不健全的社会产生政治，不健全的社会又需要政治。政治是一把双刃剑，既向善又向恶，既主持人道、正义，又独行邪恶、不义。另一方面，发展政治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消灭政治。

在政治高于一切、主导一切的 20 世纪 50 年代至 70 年代，即使是一贯浪漫自由、我行我素的文学，也不可避免地被纳入政治构设的社会环境之中，并受政治的规约。迄今为止的当代中国，凡是过于政治化的年代都不利于文学的发展。中国当代文学的政治化年代，始于 1949 年 7 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大致终于“文化大革命”结束的 1976 年。第一次全国文代会确定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新中国文艺的总纲领，并把《讲话》中提出的“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方向，规定为新中国文艺的总方向。文艺“为人民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体现的是一种明确的政治立场、政治取向。这一论断其实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内核——“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派生物，毛泽东在《讲话》中直言：“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转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革命文艺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齿轮和螺丝钉”，“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文艺为人民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与“文艺从属于政治”同义等值，前者指出了后者的取向，后者规定了前者的实质，二者互文，表达的则是“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大义。话虽没直说，但意思是明确的。现在没说，不妨以后不说。其时已呼之欲出的“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很快就变成了现实。从 20 世纪 50 年代初至 70 年代，文艺界乃至整个思想文化界频繁发动的全国规模的批判运动，不断强化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合法性与权威性。与此同时，政治及政治化的文学在不断升级的批判运动中把自己推上极端。20 世纪 50 年代至 70 年代文学的一切功过得失，几乎都与政治密切相关。我在想，如果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不是以《讲话》作为新中国文艺的总纲领、总方向，如果从 20 世纪 50 年代至 70 年代文艺界没有不间断的批判运动，如果没有政治对文学寸步不离的规约，中国当代文学该是怎样的发展方向，取得怎样的成就，我真不敢猜想。

近 20 年来对 20 世纪 50 年代至 70 年代文学的重新评价，多集中在“十七年文学”上。这确是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中的一个难题，一个绕不过去的“结”。20 世纪 80 年代，对“十七年文学”的

重新评价，主要是两种相对的观点。一种观点从今天的立场出发，对“十七年文学”持否定态度，其依据是十七年中的政治出了问题，作为为政治服务的文学自然不可取。这种绝对主义的看法简单武断，感情用事的成份甚重，抛弃了对文学的正确理解为前提，不足取。另一种观点认为应该从我国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特定的社会情况出发，准确地把握这个时期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进而在这个历史范围内重新评价“十七年文学”。这是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但它的立论和结论却似是而非，即“十七年文学”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期的现实，因此，它是真实的。一种观点很难同时占有否定与肯定的两种位置，这种论断吊诡的是，它同时占有了否定与肯定这两种位置，只不过那个被否定的“政治”作为前提被隐去了。看来，这还不是科学性。

近几年来关于“十七年文学”的评价，丁帆、洪子诚、陈思和等人的研究对此作出了实质性的推进。但我也看到，20 世纪 80 年代的那两种看法经变换表述方式后，仍占有较大的言说空间。而另一种新见则主张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中退出，以便回到文学自身。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中退出，退到哪里？自然是退到没有政治阴影的纯粹性的文学那里，这当然是一个很好的想法，谁不愿意看见充满浪漫自由的文学无拘无束呢？转面一想，这一准不是“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我不否认文学有自己的发展逻辑、自己的演进方向，但这些不能作为文学可以摆脱政治对其影响的依据。我也不否认可以暂时把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放到一边，对具体作品进行审美式的解读，但我怀疑，这种一厢情愿式的解读是否真能抵达作品的真谛。回避了政治，就真能把文学谈好，若真是这样，当代文学史写作也太容易了。何况，你写的是文学史，真能像你所说的那样，能够把已经渗入文学之中并与文学血肉相融的政治因素从文学中排除出去？显然办不到。被政治化的文学已成为“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的主潮，我实在想像不出，它们还可以变换成未受政治影响的清纯少女。政治对文学的监控准有疏忽的时候，文学可以借机任性一番，但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特别是在“文革”时期，这种机会并不多，往往是有限度的任性之后，带来的则是更严厉的被控。这样看来，还是无法退出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既然退不出去，就不要退。事实如此，历史如此，你就能于历史而不顾自作主张？还是尊重历史吧，这里不能感情用事，不能图方便痛快。这里需要的是深刻的思想、厚实的学识和学术的真诚，以及面对难题的勇气。我针对问题发问，指出问题的症结所在，但我一时解不了这道复杂的难题。在这个问题上，我的思想也时常自相矛盾、模棱两可。我知道，解决这道难题非一二人所能行，它甚至需要一代学人共同的努力。

启示二：考古是年代越久越难，治史是年代越近越难。后者之难，不是难在史实不清不全上，而是难在缺少作为历史叙述必须有的距离，“缺少了距离，许多文学现象内在的矛盾的各个侧面都没有充分的显露，匆忙地就已经显露的侧面去作历史的叙述与判断，就有可能遮蔽暂时还没有突显的，甚至可能是更为深刻、内在的方面”^[7]。对于仍处于发展中的中国当代文学来说，其难更甚。无法拉开作为历史叙述必须有的距离，其弊除许多文学现象没有得到充分显露外，至少还有二：一是由于当代文学一直与现实社会互为作用，现实社会中的许多敏感问题与它相关，何况它自身还有不少敏感点，这些敏感问题与敏感点在一定时间内是拒绝言说的。尽管我们现在在文学研究中可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便于言说，但我们还是被隐隐约约地告之，有些问题暂时还不能像摊底牌那样说个透。而文学史又要求对进入到它视野的文学现象、文学思潮和作家作品给予充分的言说。怎么办？说还是不说，怎么说，说到什么程度什么份上，都是个难事。这一切，全因为后面隐着一个政治。二是文学史主要是文学创作构成的历史，但不是所有的文学作品都能进入文学史。文学史有它的限定，有它的构成原则，限定即选择、即排斥。它在时间的推进中展开，哪些作品能进入文学史，在文学史中占据什么位置，应该给予怎样的评价，哪些作品不能进入文学史，都需要时间对其进行反复的解读和价值判断。距离太近，作品没经过充分的沉淀，判断势必摇摆。贾平凹说，一部作品是好是差必须等 50 年，半个世纪后还有人读就是好作品，否则什么都不是。此话有理。

弊在，但中国当代文学史还得写。怎样写才能最大限度地避其弊，两部史著告诉我们，最好是这个领域真正的一流学者去写，陈思和、洪子诚的两部文学史之所以能够在多部文学史中脱颖而出，多少也能说明这一点。我最担心的是这次关于中国当代文学史写作的讨论之后，又出现新一轮的编写中国当代文学史的高潮。近 20 年来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编写与出版，据不完全统计，已出版三四

十部之多，加之各种“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和各种专题史中包含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其总数不下百部之多。短短的50年文学，怎么能支撑得了这么多部史著的重压。再掂量掂量，能经得起10年而不衰的史著，我看极少。多数是低水平的堆积木，仅仅满足于“出书”。拉一个名角树一杆旗当主编，然后网一群道行不深或刚入道的行中人匆匆搭一个草台班子唱大戏，主编高兴，编者高兴，出版社高兴，大家都高兴，惟有大学中文系的教师和学生不高兴。这份最难做的活，在许多人看来，恰恰最容易，所以有那么多人热衷于此道，这是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一大怪事。没有必要都奔文学史，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来说，文学批评和史论更重要，没有高水平的关于文学现象、文学思潮和作家作品的研究作基础，恐怕难写成经典性的史著。

参考文献

- [1] 陈思和、王晓明. 主持人的话 [J]. 上海文论, 1988年(4).
- [2] 陈思和、王晓明. 关于“重写文学史”专栏的对话 [J]. 上海文论, 1989年(4).
- [3] 陈思和. 笔走龙蛇 [M]. 台北业强出版社, 1991. 78.
- [4] 丹皮尔. 科学史 [M]. 商务印书馆, 1975. 1-2.
- [5] 艾兰·乌德. 罗素哲学: 关于其发展之研究 [J]. 引自罗素. 我的哲学的发展 [M]. 商务印书馆, 1982. 241.
- [6] 罗素. 西方哲学史 [M]. 商务印书馆, 1976. 5~12.
- [7] 钱理群. 读洪子诚〈当代文学史〉后 [J]. 文学评论, 2000年(1).

Two history works and one topic — interdisciplinary thinking of the writing of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history

WANG Da-min

(Chinese Department, Anhui University, Hefei 230039, Anhui)

Abstract: The writing of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history has been an academic hotspot since it was put forward, however, the efforts on and discussions about it are still not sufficient. Taking *Scientific History* and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as examples, this paper sums up what inspiration their success can offer to the writing of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history. This is also a try to think about the writing of literature history not from the literary angle.

Key words: the writing of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history, *Scientific History*,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politics, distance